



兒童少年文學理念的 的 建立與發展

■林政華

現代國人觀念中的兒童文學，最早是由西洋傳進來的。而西洋兒童文學作品傳入中國的時間也很早，明朝熹宗天啓五年（西元一六二五年）就有名爲「況義」的伊索寓言譯本刊行；但，當時是作爲成人讀本。第一部國人真正爲兒童而翻譯的西洋作品，是周作人先生於清宣統元年（民國前三年，西元一九〇九年）二月，翻譯的英人王爾德童話「安樂王子」（見王泉根「周作人與兒童文學」頁二〇八），但它係在日本出版；次月，孫毓修先生翻譯「無貓國」童話，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，中國小孩才有福享受兒童少年文學作品的趣味。也從

此，隨著西洋作品的逐譯，兒童以及兒童少年文學的觀念逐漸東來，因而建立了國人自己的兒童少年文學觀念。不過，在發展過程中也難免有些爭議。

一、杜威「兒童中心」論的提出

中國數千年傳統的兒童觀，多半主張不必重視他們的存在，或「縮小的大人」之觀念中。這些不正確的觀念，在清末民初的大遽變中，快速的被淘汰，國人亟思建立新的兒童觀、兒童教育觀乃至兒童少年文學理念。就在此時，美國實驗科學、自由教育主義哲學家約翰·

杜威先生，於民國八年五月一日來華講學，先後且長達兩年。他對中華文化、思想、社會和文學等多方面，均有所啓迪與影響。

杜威先生宣揚他的一般人所謂的「兒童中心論」的教育理念，不遺餘力，目的在反對赫爾巴特等為代表的傳統教育。他對兒童有如下的了解：

「兒童的世界是一個具有他們個人興趣的人的世界，而不是一個事實和規律的世界。兒童世界的主要特徵，不是什麼『與外界事物相符合』這個意義的真理，而是感情和同情。」

因此，他主張要教育兒童，就得以兒童為中心來加以設計，他說：

「整個教育過程中，兒童是起點，是中心，而且是目的。（中略）在學校裏，兒童的生活成為決定一切的目的，凡促進兒童成長的必要措施，都集中在這個方面。（中略）學校科目相互聯繫的真正中心，不是科學，不是文學，不是歷史，不是地理，而是兒童本身的社會活動。」（「明日之學校」文）。

他這種「教育即生活」、「學校即社會」以及「自由教育論」的一系列教育觀點，是源於他認為人的有機體內有一種天生而不變的「本能」，它是人類「掌握知識的自然工具」（同上引），所以，他當然反對傳統的灌輸教誨，而是要兒童啓發「心理內部開始的有機同化作用」，由兒童在活動中獲取直接的感性經驗。杜威氏這種教育思想，代表二十世紀初期嶄新的兒童觀、兒童教育觀，對中國傳統教育的衝擊特大。

二、「兒童本位」文學理念的建立

在受到杜威的影響後，民國十一年「新學制」中即充滿「兒童本位」的教育理念，反對禮教及封建教育。周樹人先生首先發難，他早在民國七年四月所作小說「狂人日記」中，已有「救救孩子」的「吶喊」，次年十一月又作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」一文，說：

「孩子的世界，與成人截然不同；（中略）所以一切設施，都應以孩子為本位。」（見「墳」一書頁一四七）

他接著談及兒童文學，說：「為了新的孩子們，是一定要給他們新作品。」

他的弟弟作人先生也在七年十二月發表「人的文學」一文，革新文學的內容，重視「人」的存在，兩年後發表「兒童的文學」一篇，主張兒童文學是「小學裏的文學，（中略）是單指『兒童的』文學。」它不是「高深的文學作品」，而是依據和大人「在生理心理上」不同的兒童特性而提供出來的作品。他又在十二年發表「兒童的書」一文，說：「兒童的文學已是兒童本位的，此外更沒有什麼標準。」使「兒童本位」一語晚於郭若、鄭振鐸先生等，但周氏兄弟的看法，無疑是受到杜威氏的影響的。

接著，在十年十一月，嚴既澄先生「兒童文學在兒童教育上之價值」一文，明白對兒童文學下定義，說：

「兒童文學，就是專為兒童用的文學。他所包涵的，是童謠、童話、故事、戲劇等類，能喚起兒童興趣和想像的東西。」

上述周樹人「以孩子為本位」，係從兒童

觀上立說的，而郭沫若在十年末十一年初，則針對兒童文學正式提出「兒童本位」說，他的「兒童文學之管見」一文說：

「兒童文學，無論採用何種形式，是用兒童本位的文字，由兒童的感官以直趨於其精神堂奧，準依兒童心理的創造性的想像與感情之藝術。」

陳福康先生對「本位」一語解釋說：「就是根本、中心或出發點的意思。」（「論鄭振鐸的兒童文學思想」文）

周邦道先生在十一年六月發表「兒童的文學之研究」之文，略本郭氏說而另有新意，說：

「所謂兒童文學者，即用兒童本位的文字組成之文學，由兒童的感官，可以直接訴於其精神的堂奧者。換言之：即明白淺近，饒有趣味，一方面投兒童心理之所好，一方面兒童可以自己欣賞的文學。」

主張「兒童本位」者，必重視兒童心理的特性。周氏文中所說「明白淺近」即是兒童性的代名詞，而末句「兒童可以自己欣賞」一義，旨在注重配合兒童本身的賞讀和瞭解能力，對兒童性作更明白的註解。

十一年八月，鄭振鐸先生演講「兒童文學的教授法」，也沿用「兒童本位」之名，說：「兒童文學是兒童的一便是以兒童本位兒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學。」終其生未改變此種看法。

此外，十三年十月，江蘇無錫第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教師朱鼎元先生，出版「兒童文學概論」一書（上海中華書局版），也信從兒童本位的文學理論；但他特別著眼在兒童的生活與其需要上，說道：

「兒童文學，是建築在兒童生活和兒童心理的基礎上的一種文學，以適應兒童的需要的。」

至此，兒童本位的文學理念完全建立，影翫家創作出不少好的，童心洋溢的兒童少年劇作品，使兒童少年文學逐漸脫離成人文學的羽翼，而作獨立的發展。

三、「童心」論產生的背景與主要觀點

由於杜威氏「兒童中心」論的基本缺陷，是無限的誇張了兒童自身的作用，要求從兒童自身的興趣出發，來決定兒童的教育，太遷就了兒童，因而失去若干的教育意義；依之而提出的「兒童本位」文學理念，也使人易誤入歧途。陳伯吹先生「讀兒童劇」一文即主張加以更革，說：

「兒童作家要一反過去那種甜蜜蜜、軟綿綿的、濫情而無原則地遷就和討好兒童的態度，熱情地去安家落戶在兒童世界中，深切地去領會活生生的心靈，實地去了解兒童蓬勃的興趣。」（見所著「兒童文學簡論」，四十八年出版）

陳氏對杜威所說「施教者，不應特定一種宗旨或主義，以束縛被教育者」的看法，尤其反對，說道：

「兒童文學的特殊性是在於具有教育的方向性，首先是照顧兒童年齡的特徵，說明白些，是兒童心理的特點，要求了解兒童的心理狀態。（中略）就在這藝術的生活圖景中，教會少年兒童如何對待生活，如何培養自己的道德和人生觀。」（同上）

這就是陳氏的「童心」論。他主張由大人出發去理解童心，去為他們創作適合賞讀的作品，來教育他們，提升他們；而不是一味的以兒童為中心。此外，吾人也可以由陳氏的界定兒童文學，而了解他的「童心」之論，他說：

「兒童文學並不是教育學的一部分。但是它要擔負起教育的任務，（中略）還要完成一項特殊的任務，進行語言教育〔，〕以發展、豐富兒童的語言，並提高他們閱讀的能力。」（「談兒童文學創作上的幾個問題」，四十五年六月號文藝月報）

四、對「童心論」的 批評與反批評

陳伯吹的「童心」論，本是一種很正確的兒童文學理念；但是他太重視政治性，如他說：「兒童文學（中略）和成人文學同樣從屬於政治而為政治服務（中略）它要擔負起教育的任務，貫徹黨一指示的教育政策。」（同上引）這麼的偏向「政治兒童文學」，但在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，仍受到「點名批判」，例如：四十九年七月一日文匯報「兒童文學同樣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」文，說他的理論是「穿在他的資產階級兒童文學理論體系身上的外衣」。批判者重視兒童文學的「階級性」，要求為「社會主義」服務。這類無理批判陳氏的文章不少，除上所引述外，又如：

肖學森·評陳伯吹反動的兒童文學「理論」（四十八年六月大批判第八期）

宋爽·「兒童本位論」的實質（四十九年五月三日作，四十九年文藝報第十期）

何思·什麼樣的翅膀，往哪兒飛？—破除陳伯吹童話之「謎」（四十九年六月號人民文學）

批陳是從民國四十八年（一九六九年）正式開始的，而以次年為最烈致使人人自危，影響了兒童少年文學創作與理論的研究；黃河濤先生說：「對於『童心論』的批判，模糊了人們對於兒童文學特點認識的界限。使兒童文學創作愈來愈『成人化』，（、）『公式化』，（、）概念化。」（「『童心』淺論」文，七十一年七月「兒童文學研究」第七輯）就是沈雁冰（茅盾）也要說：「一九六〇年（按：民國四十九年）是兒童文學理論鬥爭最熱烈的一年，然而，恕我直言，也是六年兒童文學創作歉收的一年。」他舉了許多實例來證明（五十一年第八期「上海文學」六十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）。

以上黃、沈二文均對陳氏「童心」論作持平的討論。此外，七十四年二月蔣風先生的「『童心論』辨析」一文（見所著「兒童文學漫筆」一書，也很深入的探討；不過，字裏行間仍隱約批評陳氏的理論不夠完整、明確和深入。

政府遷台後，由於經濟、社會以及政治等種種因素，幾乎直到民國五十年前後，才開始注意兒童文學，對兒童少年文學的觀念，也由西方及東洋移植而來。由於當時外國兒童少年文學已甚發達，理念也頗為正確，所以，並未產生重大的理論上的爭議，派別較不明顯；即使若干認知上的層次有差距，但大抵是一致的，這是在良好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幸運發展的結果。（七十九、四、二十一）

（作者：省北師院語文系副教授）